

语言学概论

周辨明 黄典诚 译著



语言学概论

周辨明 黄典诚 译著

出版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

印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120千字 1插页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300

书号：7159·948

定价：1.30元



坐者周辨明教授，一九八四年四月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立者黄典诚教授，现年六十九岁

序

本书著者之一周辨明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前辈。他很早就提倡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他还一直盼望通过汉语拼音化来促进万国通语的诞生。他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想家，但又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实际家。他知道要使人们信服他的主张，必须首先让他们知道语言是怎么回事，让他们知道语言总是在变的，语言和方言的分分合合是有内在和外在的因素起作用的，然而人们虽然不能改变语言演变的道路，却仍然可以因势利导，使它朝着更有利于人们交际的方向前进。为了这个目的，辨明先生和他的弟子黄典诚先生编写了这本《语言学概论》。我不敢说所有这本书的读者全都会成为象他们二位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我相信他们全都会从这本书里获得关于语言和语言演变的知识，因而更容易理解和欣赏一切使语言更能发挥有益的作用的努力。

吕叔湘

1981.8.16.

FH61/it

春风化雨忆周师

黄典诚

道德文章何处寻， 师门受惠至于今。
彦伦言韵思邯堡， 元任偕游噪竹林。
横写定型如汉字， 半规钢笔似西音。
年来时有周公梦， 犹是谆谆一片心。

公元一九三三年秋季，我进入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有同乡同学指点我，你在注册的时候要小心。你们文学院院长是个驰名国内外的语言专家，很喜欢根据学生的发音判断学生的乡贯。有时候还会用你的方音向你问这问那，你得做个准备。到时候，我怀着一种畏怯的心情，走进院长办公室，向着西装笔挺端坐其中的院长鞠了一躬，呈上选课表。我说：

“Qǐng Zhōu yuǎnzhǎng qiānzì!”

“Nǐ shì Běipíng rén?”

“Búshì Wǒ shì Zhāngzhōu rén。”

“Zhāngzhōu rén? Dài guò Běipíng jǐ-nián?”

“Zhōu yuǎnzhǎng, wǒ méi zài Běipíng dài guò。”

“Děng shàngle kè, dào Hānbǎo wǒ jiā tántan。”

上课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上“邯堡”①拜谒了他。他和师

①“邯堡”是老师在厦大校园中自建的一座小楼房，用以纪念其母校德国邯堡（今通译为“汉堡”）大学。厦大的“邯堡”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炮火所毁。

母（朱秀峦）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刚从内地出来的土头土脑的新生。他问我既然没呆过北平，这一口北平音是从哪儿学来的？我敬谨回答了一个大略的经过：小学时代跟了一个毕业于上海国语专修学校的老师（郑黄文）学，后来上了旧制师范，又遇上一个原籍北平的国音老师（陶锡斌）。他闻言点头，情深意重地指示我：“你很有语音基础，以后就专攻语言吧！”

一年后，周老师邀我住进了他的“邨堡”，课余当了公子颀西的家庭教师，并帮刚从伦敦回国的英文教授李庆云（Ather Lee）补习汉语。“邨堡”是一座小洋楼，地处镇北关口，依山面海，景色极佳，堡的四周，砌有象征性的雉堞，雉堞之内，有个可供散步的草坪。远望太武^①，塔影依稀；极目担外^②，风帆明灭。

我给颀西授课就在老师的书房里，四壁图书，窗明几净，至此，我不能不有范希文“心旷神怡”之感了。但是线装精装，中文外文，一橱又一橱，真是浩如烟海，何时才能读得了这么多的专业书籍呢？~~学海无涯~~：我这一叶扁舟，将何以“驾言出游”^③呢？

我从当时的《厦门大学入学手册》中看到周老师的简历是：周辨明，字忤民，福建省惠安县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学士（毕业考试第一名），清华大学英文教师，英国伦敦东方语言学院讲师，德国汉堡大学言文学博士。（陈嘉庚讲座教授^④）

后来更从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里获悉周老师是

①太武，全称南太武，在今龙海县港尾公社。太武峰巅的古塔，也已毁于日军的炮火。

②担外，指厦门港口大担二担小岛以外的大海。

③“驾言出游”句见《诗经·邶风·泉水》。

④陈嘉庚讲座教授，是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设以纪念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其职甚高，其薪独厚。

“数人会”的成员。“数人会”成员只有七个，所以有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七人，除周老师之外，尚有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林语堂、汪怡、刘半农。他们这七个人是国语罗马字的始创者。在国语罗马字拟订前三年，周老师先已有一本《中华音声字制》问世了。

在厦门大学的教学中，周先生的主要精力几乎都放在英语教学上，他善于引进先进的英语教材和英语教学法。英语语法他采用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的三品说，教学法则试用了刚刚引进来的直接法。因此周先生尽管是言文学博士，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却很少开设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课程。记得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他才抽空开了一门选修课《厦语语音学》，教材就是他在德国汉堡大学的博士论文《厦语音韵声调之构造与性质》和《厦语声调实验录》。他用闽南方言为实例讲解了历史比较法。他和瑞典学家高本汉教授虽有深交，但不满意于高的机械的拟音法。他常说，现在的汉语诸方言中，音韵最接近《切韵》系统的是闽南方言。由于他的谆谆善诱，我终于选定《闽南十五音研究》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毕业于厦门大学语文系。其时正当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之际，芦沟桥事变发生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从而揭开了。为了避免日机日舰的骚扰，国立厦门大学内迁至福建西部的长汀县。那时候，周老师以学校“元老”出任教务长，每周授英、德、法诸国语文课多达十六小时，工作忙不过来，乃建议校长聘我为语文系助教兼教务处襄理。从此师生朝夕相处。一有时间，他就继续对我耳提面授，什么方言调查，文白对应，本调变调，本字借字，远近亲疏等等，无所不谈。在学生时代，我只跟他学过一门选修的语言课；但是在七闽僻壤八年抗战中，我却增进了很多又有系统又较深入的语言基础知识。后

来，我们在一个时期里，利用每天下午的时间，师生二人共聚在长汀城里的北山底下“中诚楼”上，先讨论、后执笔，日积月累，终于写成了这本《语言学概要》。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一些最基本的信而有征，行之生效的原理原则。周老师在语言研究上，引导我眼睛要向前面看。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万国通语论》，正是对于大同世界如花似锦的未来语言从各方面推测其种种可能的模式。《在迈进中的中国罗马字》一文中，他对我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正式提出“通性方言际拼音”的建议。

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老师奉命先回厦门主持学校复员的工作，让一九四五年新招的学生在厦门鼓浪屿八卦楼上课。全校迁回厦门之后，复员办事处易名为新生院，他承担了院长的职务（文学院院长照兼）。从此他卷入行政事务工作中。那时他已年过半百了，但还抽时间自修荷兰文。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在抗战前夕已特约他写本《语音学》，到这时，他约我为助手，准备动笔了。忽然中英协会约他去伦敦剑桥大学讲学，他只好放下原计划出洋去了。后来听当时在英国伦敦留学的郑朝宗先生说，英国大学生反映周先生的英语说得比伦敦人还标准。

周老师讲学完毕，返回到新加坡，为厦大毕业校友所挽留，先与陈嘉庚先生同寓怡和轩，后乃迁居“香港花园”。当他出国讲学前夕，我们夫妇俩为他饯别，原想暂时分离，会当再见。不想一去三十余年，现在他已经是九十有二的高龄了，而我这个小学生也年近古稀了。

周老师在从事语言科学研究活动的七十年中，精力所贯注的中心命题为汉语拼音化和汉字索引法的研究。

他对于汉语拼音化是坚定不移，七十年如一日的。他认为汉语拼音化必须采用二十六个字母，同时他主张汉语拼音不能排除

声调的标出，而声调的标出又必须采用字母标调法，以解决电报打字排印乃至电脑信息输入的困难。他的通性方言际的拼音，是设想使拼音文字绝对定型而能收到和汉字一样的见形识义的功效。直到最近，他还发表《竹林标调法》以重申其主张。

他的汉字索引法——半周钢笔法，是很有创新精神的索引法。他认为，西文索引法之所以不成问题，是由abcdef等已成为历史的传统，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现在要使汉字的索引也象西文那样简单，必须让汉字基本笔画（他称之为解字的钢笔）也有个可以理喻的顺序，因此他利用钟表长短针在半圆形内的推进趋势，定下十种钢笔次序如右，解字的次序是“自右而左，按高而下”。如“语言”两字，“言”的首钢笔“、”是0在前，而“语”的首钢笔“一”是1，一定在0之后。又如“言”与“音”两字同是“丿”头，可不计。但“言”字是“丿下一画”属1，而“音”字是“丿下丿”属8，故“言”在前而“音”在后。余类推。



目前在国外，语言学说日新月异，流派极多，大有目不暇给之概。去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会议上，有位美籍华裔学者告诉我，美国目前那些翻云复雨的新学说，往往只能迷人一时，不堪经久考验，国内学者请不要为其奇谈怪论而眩惑。难怪国内某些老专家要写信向北京语言学院《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建议为周先生题名立传；又有前辈学者当年看过我们在战争烽火中排印的这本《语言学概要》小册子，还留有深刻的印象，还鼓励我们找机会重版。

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凋零殆尽了，周老师是“竹林七贤”中硕果仅存的蹒跚一老了。他对于祖国语言学界的一切活动，一向十

分重视：一九八〇年十月全国语言学会成立于武汉，他给吕叔湘先生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一九八一年七月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于哈尔滨，他又向倪海曙同志发来充满激情的贺电。

周老师非常系念桑梓，关心祖国，十年动乱之后，很想回国看看，可惜上了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怕长途跋涉受不了，终于回不成。

听说他老人家现在不能出门了，但仍然昼夜孜孜不倦地钻研本行业。师生阔别三十多年了，自己在语言科学研究范围内还有很多疑莫能决的难题要向他老人家请教，但是海天远隔，相去万里，要是能有个见面的机会不很好吗？写到这里忽接其幼子颖南自海外来信，内云：“母亲逝世四个月了，父亲因乏人照顾，寝食难安，恐怕也不会很长久了！”至此，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真已不知所云了！

1983—08—30于鼓浪屿鹿礁寓庐。

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新加坡周颀西电报：“父亲四月廿八日去世，谨讣。”捧电涕泣，怅望南天，告别无从。谨以此书之出版，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1984—10—18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弁 言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在学术方面，重于现在及已往语言的观察、记载、分析与整理。可是在应用方面，对于将来国际通语的建设，以及本国语文的改进，语言学家，义不容辞地，仍须负起责任来。语言的问题是不可以小看的。人类的语言文字越多，差别越甚，到底是人类的不幸，不是幸福。现在世界已呈曙光，在语言方面，要使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语言学家还可卸责旁贷吗？

我们本此旨趣，编撰此书。我们愿就语言史上种种尚堪回顾的事件提供出来作为创造通语的参考；而由于登高自卑，行远自迩的方式，本书对于本国的语文问题，自不能不加以深切的注意。对于这方面我们的意见很简单，而用意很恳切：我们希望九亿五千万的同胞能操说同一的语言，同时能书写与口语相应、四通八达的文字。

这书大部分译自下列三书，有时我们也把自己一得之愚参了进去。

L. R. Palmer,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
Frederick Bodmer, The Loom of Language

Sylvia Pankhurst,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

书后附录的是我们自己所写的东西。因其性质不出于语言研究的范围，所以就以类相从地来牵请同事们的指正。（以上1945

年11月23日写于长汀)这次重印,承叶宝璜同志核对术语,特此致谢。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基础的原理·····	(1)
第二章	语言的原料和取材·····	(12)
第三章	在演化中的语言·····	(31)
第四章	形态与功用之相应·····	(46)
第五章	意谓与意谓的变迁·····	(61)
第六章	文字·····	(81)
第七章	语言的地理·····	(97)
第八章	语言的分类·····	(120)
附录 (一)	中国古今方言注音记调实用字母调符的研究·····	(143)
(二)	转注抉原·····	(151)

第一章 导论：基础的原理

研究语言的人，一定先要简单地置问：语言是什么？说话既是那样自自然然不自觉的行为，而语言又是跟那说话者有心身不可分离的关系，遂使“语言为什么会存在”和“语言为什么有它的功能”，这类问题，在日常生活里，几乎不会发生。可是当我们一进外国，最先能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那儿的人用了嘴巴发出一串奇怪的噪声，其他的人听了这些噪声，他们的举止在某某方面就有了反应了。实则语言的精粹也就在这里。语言乃是说者用来感导同人的行为所发出的声音。反过来说，语言也就是听者由于说者发出的声音所得来的解释，因而得以明了说者心中的意思。

语言有三个正常的功用：（一）它表示说者的思想、感觉等等；（二）它会感导听者的行为，这就叫做唤起功用（*evocative function*）或成效功用（*effective function*）（所谓“行为”，乃指最广义的行为而言）；（三）它象征着所指的事物，要是没有后面这第三功用，那前头的第一、第二两个功用就不能收效了。所以作为声音跟意义连系关键的象征功用，乃是语言机构的要素。这么着，我们可以定语言的界说如下：语言乃是一种用人类的声音做材料的象征制度，它是社会成员的共同的实际工具。语言不是文字，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罢了。用不同的文字来记录同一的语言，非但是绝对可能的事，并且不会改变那语言的原体。

有人立刻要问：人类为什么需用语音这种设计？我们可以回

答他说：因为两颗心灵不能直接沟通，所以有这种需要。心灵沟通这件事，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姑搁在一边不谈。平常说来，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心思直接搁置在我们所想要传达的人的心里。我如果要跟某人通消息，我可以插一朵花（如英人说：“Say it with flowers”），或把邮票贴成特别的形式作为表示，或在脸上装个特别的模样、或演手势、或发出奇特的声音。在海伦克拉（Helen keller）这个既盲又聋的女子一例上，她的教员便利用触觉授意给她。那教师发明一个用手按拍的方法，凭着这个方法他们俩便可以互通消息了。假如没有这种方法，则海伦克拉能受教育的奇迹必不能成功。因为只有用某某方法来触感五官之一，我们才可以把消息通到接受者的心里去。这建立在心与心之间的交通方法，就是语言的基本课题。可是在这些通讯方法之中，有的是用“信号”（signs），有的是用“象征”（symbols）。在象征之中又有用身体的动态姿势（gesture），符号、文字、物件、气味、等等，但是都不能称为语言。所以在未讨论语言本身的通讯方法以前，我们须先分辨“信号”与“象征”在性质上不同之所在。

有人说过，只有由于观察别人的行为所得来的推测，我们才能晓得那人如何运用他的心思。例如我红了脸，观察者必以为我不是羞惭就是难为情。倘或我眼皮在微跳，则观者也会以为我心慌。他所以能够这样推断，是因为在他自己的经验中，每逢有着这样感觉的时候，身体上总跟着也有这样相应的表现。这就是说，从观察的结果，我们可以推测对方跟自己，在同样情形之下，心理状况常是相似的。但是脸红与说话，两者之间，大有不同，神经系统受了羞耻的刺激以后，不可自主地脸就红起来了；所以害羞的心理状况，跟脸红的生理信号，这中间该还有因果的关系。

但如咱们中国人所说的“我害羞”这种声音，却是在个人意志控制之下而发出的，这样的声音组合（sound-complex）跟心理状况的关系，全出于人们偶然的杜撰（arbitrary）。假如我是法国人，那我所用的一套语音必定跟中国人不同；假如我是德国人，自然又要另用一套语音了。可是法国人跟德国人的脸红究竟与我们一样。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把信号（sign）与象征（symbol）分辨出来了。脸红乃心理状况自然无意识的流露的结果，所以脸红就是那心理状况的信号。但“害羞”这声音组合却是人们杜撰的，是我们故意发出的声音，假使听者由于这种声音的解释，间接而知道我们心中所蕴藏的是什么，这便是象征。又如烟是火的信号，但〔xuo〕这一声音组合，就是火的象征。语言的象征性质乃是杜撰的，这一点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因为这是语言学基本的概念。要是我们把生物用以通讯的方法与人类所用的语言比较起来，我们必能更加明白这一点基本原理的重要性，而且可以知道哪一种的象征方法才是正统的语言。

德国科学家翡礼士（K. V. Frisch），对于蜜蜂的社会生活与其通讯的方法，曾做过不少有趣的观察。他用一张纸涂了蜜，放在蜂巢附近的地方，寻常要经过数小时或好几天，蜜蜂才能发现这放纸的地方。一经发现，可就忙碌起来了，那蜂登时把身上负担的蜜汁带回巢里去，马上又回到放置蜜纸的地方。但它这趟并不是独自行动，——你看，不久便有几百只蜂挤满在那张蜜纸上了。这明显地第一只蜂曾以某种方法传告其余的同伴，但它怎样传达这消息呢？最精细的观察告诉我们，首先发现蜜纸的那只蜂回到巢里的时候，曾举行一个有趣的仪式。那蜂一卸下负担，就跳起舞来，由其跳舞激动了同巢的众蜂。众蜂即将该蜂团团围住，一只只用触须去摸它，忽而该蜂停止跳舞，就飞出去了。由翡氏的观察，群蜂并没有跟它飞出去，但过了些时，众蜂

会循着来路而找到那发现蜜纸的地方，即使蜜纸已经移开，换置了糖水，它们也一定会飞到那里去的。众蜂怎样会晓得？那消息是怎样传递过去的呢？翡氏从多次的实验中得到如下的结论：蜂一进花丛，花的香气就沾在蜂的身上。别的蜂闻了那香气就也飞出去找同类的香气。虽然众蜂寻觅的结果竟是没有香气的糖水，却也算是成功。再经实验之后，翡氏又发现蜂的身上有腺，能散发出香气，众蜂就把这香气，加在所寻得的东西的上头，做个记号。那糖水既然渗透了蜂的香气，自然会从大范围中吸引许多蜂到那边去。要说蜂的语言，就是这样。

蜜蜂这种粗率的象征办法，究竟比不上人类的语言。它的应用有限，缺点也多，这是显而易见的。那象征与那象征化之物，出于同一范围之中，而构成此象征的材料也相同。因此，这种象征只能应用在比较简单的物件之上。如果要应用在人类较为复杂的通讯里面，那就应该选择一种较有弹性、较不笨重的媒介了。我们不能随时携带我们所须提及的物件的格式标本到处奔走。要是抽象的“爱、敬、顺”等观念，那就更没有具体的东西可以携带了。可是我们却时时可用我们的发音器官发声。人们有权力可以利用这工具来构成象征，这便是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所以有绝大的区别。我们的语言工具最便于应用，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应用语言时，全是那非物质化的象征，既可以不必跟所要表示的物件相类，又可以不必去仿效它。原来我们的语言只须把心里所有的观念硬行分派给一组一组的声去负担就成了。从这儿我们应该晓得，在象与物之间，还另有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应该进而考问：语词与事物的特殊关系究竟是怎样？这关系是从哪里发起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

由于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Pavlov）的实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更加明了人类的儿童阶段的语言象征，是怎样发展的。